

DOI: 10.13957/j.cnki.tcx.2024.03.022

引文格式:

陈猛. 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社会变迁中的角色: 政治、生产与文化建构[J]. 陶瓷学报, 2024, 45(3): 616–620.

CHEN Meng. The role of pottery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Neolithic age: Politics,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J]. Journal of Ceramics, 2024, 45(3): 616–620.

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社会变迁中的角色：政治、生产与文化建构

陈 猛

(景德镇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032)

摘 要: 尽管西方历史学界经常强调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重要性, 但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 特别是在东亚文明的背景下, 陶器时代同样占有核心地位。中国作为陶器文明的发源地, 在这一时期的人类文明演进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探索了陶器与我国古代人类社会文明之间的相互建构性关系, 聚焦于其社会凝聚力、史前政治体系和生产关系变迁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陶器文化的深入分析, 揭示了其在社交网络与促进文化交流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 进一步探讨了陶瓷生产如何映射从原始公社制到封建结构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 本文探讨了古代中国陶器与社会如何在交互性的文化与技术框架下共同进化, 为社会学领域中“技术—社会互动”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条新思路, 为解读陶器在古代社会文明进程中的核心角色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学术视角。

关键词: 陶器时代; 社会文明; 社会凝聚力; 史前政治体系; 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 TQ174.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78(2024)03-0616-05

The Role of Pottery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Neolithic Age: Politics,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CHEN Meng

(Jingdezhen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032, Jiangxi, China)

Abstract: Despite the frequent emphasis by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one and Bronze Ages, the era of pottery holds an equally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progress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particular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As the birthplace of pottery civilization, China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inter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ttery and the ancient human society of our country, focusing on its central position in social cohesion, prehistor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Neolithic pottery culture, the decisive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network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as revealed. Additionally, the symbolism of pottery in religious rituals cited in the text, such as the mother-and-child pig sculptures,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pottery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everyday life. Combined with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how ceramic production mirror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primitive communal systems to feudal structures was further explored. Overall, how ancient Chinese pottery and society co-evolved within an interactive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framework was studied, offer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ore issue of 'technology-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Finally, an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viewpoint on interpreting the central role of pottery in the progression of ancient social civilization was provided.

Key words: pottery age; social civilization; social cohesion; prehistoric political systems; production relations

收稿日期: 2023-12-21。

修订日期: 2024-03-18。

基金项目: 2023 年江西省社科基金地区项目暨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研究课题; 景德镇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

通信联系人: 陈 猛(1984-), 男, 博士, 副教授。

Received date: 2023-12-21.

Revised date: 2024-03-18.

Correspondent author: CHEN Meng (1984-), Male,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E-mail: bingd600420@163.com

0 引言

人类的一切文化皆衍生于生活,故文化之发展方向与生活是联为一体的,古人生活演进到某一阶段后,便已确定了其文化发展之趋势。古人的生活方式演进到农业社会以后,很自然地需要陶器器具以支持其生活方式的日常需求。在中华大地的悠久文化进程中,陶器文化无疑是这块土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我国制陶历史悠久,历经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周代、秦汉时期四个时期,不同阶段各具特色、异彩纷呈^[1]。当前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多关注于现代技术,而较少关注传统技术,导致技术社会学对于技术的解析往往落入现代性解析的窠臼。技术社会学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就必须关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国制陶技术源远流长,分析其与社会的互动,有利于丰富技术社会学的视野,研究陶器时代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很有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历史的长河中,西方学术界对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进行了深入研究,常常把它们视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两个重要里程碑。然而,这种视角往往忽视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的一个关键时期——陶器时代。陶器时代往往被视为过渡阶段,其间的重要性不被足够重视。然而,对于中国来说,陶器时代不仅标志着技术的进步,陶器更是文化、宗教和社会信息的载体,对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化发展以及宗教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作为陶器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为这一历史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和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

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演进过程中,陶器不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更是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陶器在中国史前社会互动性进化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等因素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聚焦于这些互动进化的因素,旨在揭示陶器如何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的社会工具,参与并推动了中国史前社会的进化历程。本文从社会结构、政治体系、生产关系三个方面展现中国陶器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历史画卷。通过这种视角,为阐述我国古代陶器文明在这一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建构论

技术决定论的哲学基础是技术本质主义,其认为技术具有内在逻辑、价值和规律,能够通过现实使用冲击社会,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主角。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年)中提出“媒介即讯息”的技术决定论,该观点指出,不同的媒介使我们的各种感官开始不均衡地发挥功能,由此导致我们思维、行为的“尺度、速度、模式”等经验特征的变革,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变革,其认为技术本身决定社会形式。

然而,技术的发展并非脱离社会而独立运行。社会的需求和价值观也对技术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夏商周时期的青铜文明推动了社会等级的形成,上层社会对于陶器的审美、功能等需求促进了陶器技术和艺术的发展。这一阶段的陶器不仅仅是实用的工具,还成为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如 Bijker 和 Pinch 等学者指出,技术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受到社会力量、需求和价值观的影响,技术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不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社会建构论,都在单向度地刻画技术与社会关系,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布鲁诺·拉图尔等认为,技术与社会是相互影响、互为条件的。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蛋壳陶制造技术精湛,表现了当时追求技术的极致^[2]。技术的发展与当地的社会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于陶器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技术与社会需求在此形成了互动。技术进步带动了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变革又为技术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和需求。这种互动关系在我国陶器时代的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相互建构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 技术创新与社会凝聚力

2.1 小型社群到复杂社会

陶器技术的革新不仅体现在其实用性上,更在于它如何与社会结构的演化相互作用。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人类生活在小型、紧密的社群里,具有相似的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观。埃米尔·杜克海姆的社会学观点指出,此时期的陶器制造常是社群的共同活动,体现了社区的共识和团结。

在史前社会中,陶器的轮制技术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创新,大大提高了陶器生产的效率,使得大量相似的陶器能够被快速生产出来。这不仅促

进了生产力的提升,还有助于统一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随着轮制陶器成为社会交往和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共同的制陶技术和使用习惯加深了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增强了群体认同感和凝聚力。轮制陶器因其在生产技术和功能上的创新,成为史前社会文化互动和社会结构演进的重要推手^[3]。

随着时代的发展,陶器上开始出现纹饰、染色装饰,部分陶器甚至有了具象的形态,例如:仰韶文化遗址中的人面鱼纹彩陶盆(见图1),这说明制造陶器的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分工,展现出有机团结的特征。



图1 仰韶文物人面鱼纹彩陶盆
Fig. 1 Yangshao fish-faced human figure Painted Pottery Basin

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复杂化,有机团结开始出现,其特点是执行专门任务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更高。就陶器制作而言,意味着独特风格的发展、更复杂的设计,以及专业陶工和艺术家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陶器的变化反映了社会角色的多样化,以及随着社区扩张而发展的复杂社会结构。陶器的技术演进与社会结构的变革相互促进,为阐释古代文明演进提供了关键线索。

2.2 陶器:社交活动的中心

在社会学领域,物质文化与人的社交行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以陶器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不仅具有其直接的实用价值,更能作为社交和文化交流的载体,还可以被视为社会资本,因为它们在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拥有深厚的社会和象征意义^[4]。

以我国古代的河姆渡文化陶器为例(见图2)。这类陶器产自新石器时代,制作已经比较精美,其独特的图案和创新的制作工艺,不仅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技术进步,还反映了一种特定的审美文

化。这样的物品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超出了其实用性,它们在宗教、仪式和社交活动中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当这些陶器在节日、庆典或其他重要场合被展示时,它们不仅仅是日常用品,更是一种社交工具,用于表示身份、权力和社会地位,促进了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种以物质文化品为中心的社交活动,为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技术传播以及知识的共享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图2 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猪纹方钵陶器
Fig. 2 Pig-patterned square bowl pottery unearthed from Hemudu Cultural Site

埃米尔·杜克海姆的社会学理论提供了一种视角,为深入理解陶器在我国古代社会结构中凝聚的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从简单的生活工具到承载文化与信仰的艺术品,陶器的技术更迭展示了一个动态、多元且互动的古代中国社会,它的演变与社会的复杂化、分工的深化、文化交流的加强等趋势紧密相关,为解析古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3 陶器媒介与史前政治体系

3.1 陶器与政治权利的构建

陶器不仅是史前社会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政治权力和社会结构演变的关键媒介。在龙山文化中,蛋壳陶的精细制作技术不仅展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更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社会形态和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蛋壳陶的制作过程中,从原料挑选到成品制作都要求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和严格的质量控制^[5],这些都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和分工明确的社会结构。

蛋壳陶的精制和流通不仅是技术和艺术的展示,也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这种陶器往往与政治权力和宗教信仰紧密相关,其制作和使用被特定的社会阶层所控制和垄断。在史前社会中,陶器的制作和流通机制成为了操作政治权力的工

具，通过控制这些精美陶器的生产和分配，统治阶级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通过这种物质文化的媒介强化了对下属群体的控制。

随着陶器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陶器开始承载更多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例如：陶器上的纹饰和文字符号，一方面用于宗教仪式中与神灵的沟通，另一方面也象征着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知识。这些符号作为一种“密码”，不仅在宗教上具有重要作用，也在社会政治层面实现了对权力的象征性展示和传递^[6]。

因此，陶器的生产和流通机制在史前社会政治体系的形成中起到了核心作用。通过对其的控制，史前的统治阶级不仅能展示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控制加强了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在物质文化中体现了政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3.2 陶器与华夏“藏礼于器”的美学规范形成

在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中，“礼”的观念源远流长，其精神脉络贯穿于社会的演变之中。《说文解字》中对“礼”的阐释，是将礼义与行为规范的结合体现为对神灵的敬仪，而此种敬仪最早在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中显现雏形。在这一过程中，陶器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沟通天地、联结人际的重要纽带，承载着深厚的道德情感与社会规范，在华夏文明中构筑了“藏礼于器”的美学规范。

陶器既是社会互动性进化的产物，也是政治体系构建的媒介。它通过将无形的道德伦理具象化为可触之物，使得抽象的社会共识和道德规范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这种“藏礼于器”的实践，不仅是对权力与礼仪的可视化表达，更是通过物质文化的形式将统治阶层的伦理观念内化于民众心中，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社会控制机制。

随着社会的演进和历史的推移，原始的媒介形式逐渐被新的文化表达方式所取代，但“藏礼于器”的传统却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持续影响着后世。先秦时期青铜器的崛起，不仅标志着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更是“藏礼于器”美学规范演化的重要里程碑。青铜器的出现，既是对陶器制作工艺和经验的继承，也是对原始礼仪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体现了华夏文明在维系社会秩序和强化政治权威方面的深邃智慧。

因此，“藏礼于器”的美学规范不仅仅是对物质文化的崇拜，更是华夏先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于礼仪、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深刻理解。这一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既展现了陶器在史前社会政治体系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也反映了华夏文

明对于“礼”的持续探索和美学追求，为我们理解古今中外政治体系和文化规范的互相建构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

4 陶器与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关系变迁

借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可以深入探讨陶器技术如何与古代人类社会文明相互建构，并进一步理解其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关系变迁中的关键作用。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解读陶器技术如何与古代社会文明相互建构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理解其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关系变迁中的关键作用。在中国古代，陶瓷制造，不仅仅是一门手工艺，更是对生产关系变迁的有力注解。通过解析陶器工艺技术的演进，可以进一步阐释生产方式如何塑造社会结构，揭示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关系变迁中的关键作用。

4.1 陶器的原始手工生产与部落共同体

在早期的原始社会中，部落的自给自足和集体合作主导了部落民的生活模式。陶瓷制作成为这一模式的产物，为日常生活提供了必需的器物。随着农业的产生和稳定，陶器逐渐替代了石制品，成为新的生产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这时的陶器制造往往与部落共同体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相连。作为仰韶文化源头之一的裴李岗文化，其遗址出土的陶器明显展现了这一特点(见图3)。这些粗糙、简单的陶器很可能在部落共同体内部流通和使用，这体现了当时的集体主义和互助合作的社会关系特点。



图3 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彩陶
Fig. 3 Colored pottery unearthed from
Feiligang Cultural Site

新石器时代初期，生产关系简单，大多数生产活动都在家庭或小型社群内部完成。这种生产方式与当时的原始公社制相适应，各社会成员的地位相对平等，人们之间的联系紧密。这些陶器简单而实用，技术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但它们完全

满足了当时部落的日常需求。这种几乎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与原始公社制的生产关系相呼应。

4.2 陶器工艺的进步与部落间的交流

随着时间的推进,部落间开始出现交流和合作,这导致了陶器制作技术和形态的交流与融合,反映出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分工。

仰韶文化晚期陶器在技术和形态上都显示出明显的进步,这可能意味着不同部落间的技术交流和文化互动,以及部落内部出现了专门的制陶者,意味着社会分工的逐渐形成。随着部落间的交流,技术和文化开始相互碰撞与融合,陶器也逐步展现出更加精致的工艺和形态。

4.3 陶器生产的集中与部落结盟

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部落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一些制陶的中心地区,陶瓷制造开始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化特征,意味着更高级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形成^[7]。

龙山文化黑陶是这一时期集中生产的产物。龙山黑陶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高级陶瓷制品,在技术和形态上都显示了集中生产的特点(见图4)。黑陶精细的制作工艺反映了专业化分工的社会结构。在父系氏族公社中,特定的家族或集团可专门负责陶器的制作,这种分工反映了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和技能传承的重要性。技术精湛的陶器制作不仅是生产力水平的体现,也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这些陶器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技术进步,也体现了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特点。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社会组织以男性为中心,强调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这些社会特征与黑陶制作密切相关。



图4 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黑陶器系列

Fig. 4 Series of black pottery unearthed from Longshan Cultural Site

5 结 论

陶器作为人类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为我们呈现了历史的痕迹,还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展现了古代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织。本文采用社会学的视角,以陶器与古代人类社会文明的相互建构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陶器在中华历史文明中的意义。

陶器技术的演进,更是古代人类对自然、社会 and 文化的认知与理解的具象体现。陶器的技术进步,不仅体现了技术层面的革新,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的变化,揭示了社会、政治与技术发展的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蕴含着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陶器在中华文明中地位的新视角。陶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更是其文化基因和精神传承的象征。通过对陶器技术与社会文明的相互建构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背后的社会学意涵,探索中华文明的深度与广度。

参考文献:

- [1] 吴于廑,齐世荣. 世界史: 古代史编(上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2] KNAPPETT C.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pottery forming technology: Wheel—Throwing at Middle Minoan Knossos [J]. 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1999, 94: 101–129.
- [3] 何启明. 中国陶瓷文化之研究与考据[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4] 马克思·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下卷[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5] WEI J J, JIN J H, HOU C Y, et al. Prehistoric human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to Bronze period in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Southeast China, based on luminescence ages and chemical elemental analysis of pottery [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23, 319: 108325.
- [6] 刘文娜. 宗教社会学视野中的“韦伯命题”——兼论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8(1): 56–61.
LIU W N.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 18(1): 56–61.
- [7] 秦小丽. 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陶器研究的新视角[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编辑 梁华银)